

前言

某年夏天，到蒙古出差，住在傳統的蒙古包，早上要到外面的公共浴室梳洗，那一刻，想起了小時候住徙置區的日子。

我在哪裡刷牙？

沒錯，這的確是一個問題。在本書的訪問期間，常常聽到街坊說起當年的日常生活，如何在一個住了五六七八人的一百二十平方呎空間過日子，睡覺是這樣安排，煮飯要怎樣進行，上廁所如何不便，洗澡又怎樣麻煩……。我設法在腦海中搜尋刷牙的鏡頭，是否曾經在「水喉腳」刷牙洗臉？為甚麼連「在哪裡刷牙」都可以寫下去？原來最平常不過的，背後卻可以有很多故事。

就是這樣的生活細碎，看來極其無聊，但對於曾經在徙置區生活過的人，或許是一世難忘。我在小學還未畢業前都在李鄭屋徙置區生活，記得的不算太多，從來沒有想過要記錄過去。直至數年前，在 Facebook 看到了一個「李鄭屋村（七層高世代）」群組，舊街坊的文字與相片令我想起很多事情，更讓我知道了很多不知道，萌生了要為李鄭屋著書立說的念頭。猶豫之際，看到李鄭屋的「左鄰」蘇屋，與「右里」石硤尾徙置區，各自也以口述歷史方式為屋，做了記錄，我知道，這件事不能丟下。

不用擔心我繼續在討論刷牙洗臉的事情，這不是我的個人成長記錄，而是期望通過不同年代的人物訪問，把他們的生活，和對李鄭屋的所知所感一一記下。我帶著模糊的印象、許多的疑問，嘗試去理解一些關於李鄭屋徙置區的既定印象，甚麼龍蛇混雜的紅番區，回味無窮的平民美食天堂，還有那個像傳說一樣的鄰里關係。曾經有過百萬香港人在徙置區生活，相信在任何一個徙置區生活過的人也會在這些故事中找到共鳴，也希望對徙置區沒有認識的人，藉此機會回到香港五六七十年代，體會他們的生活。

不想忘記過去歲月，卻不愛沉溺於往昔情懷，是好是壞，是笑是淚，也學習欣然接受。

我想，這樣才能勇敢面對未來。

將這書送給天上的爸爸，天天在廚房忙著，我命宮中的天廚星媽媽，還有大大小小的林氏家庭成員。

目錄

前言

4

一 李鄭屋村的前世今生

12

二 徙置區與廉租屋

28

三 建築與設計

38

四 李鄭屋歷史事件

50

李鄭屋古墓——雙手見證了歷史時刻

52

雙十暴動——面旗幟引發的騷亂

61

五 李鄭屋眾生相

70

從木屋上樓

72

Case 1 事頭，老細，大哥！

蔡楚邦

74

Case 2 讀書要排隊，搵食要排隊

林懿生

86

Case 3 天台學校的日子最快樂

張顏屏

96

Case 4 好家姐成就了家庭

曾慶芳、曾慶松

110

Case 5 亞媽教落：「記得要學好本地話！」

張慈玉、張俊雄、周惠君

126

Case 6 街坊保長

陳寶隆

144

五

李鄭屋眾生相

滄海桑田，在這裡渡過多少個寒暑。
人去未留空，讓我們回到過去，憶苦思甜，
你想起了誰？



從木屋上樓

- Case 1 事頭，老細，大哥！
- Case 2 讀書要排隊，搵食要排隊
- Case 3 天台學校的日子最快樂
- Case 4 好家姐成就了家庭
- Case 5 亞媽教落：「記得要學好本地話！」
- Case 6 街坊保長
- Case 7 拜得神多自有神庇佑
- Case 8 雀友滿天下
- Case 9 回憶的家常便飯

聯合國把一九五九年定為「世界難民年」，促請各國政府集中處理難民問題，鼓勵各政府及志願團體提供財政援助，香港，是救助對象之一。

五十年代的香港，滿街都是難民。

他們從中國逃到香港，從街頭走到木屋。當蘇屋，還是山坡，元州，還是海皮的時
候，他們有的背著年幼兒女，有的拖著爸媽的手，落戶在李鄭屋徙置區。

一九五五年發現古墓，一九五六年發生了雙十暴動，一道深深的歷史痕跡落在這
十九座的七層大廈裡。然而經歷戰火天災，他們只求有瓦遮頭，三餐溫飽。

這些故事，有點像五十年代的粵語片，原來電影真的反映現實。

電影《危樓春曉》（一九五三）裡，吳楚帆金句「人人為我，我為人人！」究竟是
理想還是現實？

事頭，老細，大哥！

有時有人走來叫我老細，我都說不用叫了，我都沒再做了。從前的人叫事頭，叫老細就比較先進。

「老細，食飯未？」蔡楚邦慣常地坐在電梯大堂，跟來來往往的街坊閒談打招呼，偶爾會有舊街坊走過，「識你幾廿年！」蔡先生說：「住過二、三、四、五、六座，住李鄭屋幾廿年，好多人都話識得我，不過我又未必全部都認得。」他笑說爸爸是老蔡，他是蔡仔。嚴格來說他是「太子仔」，士多老闆個仔。在徙置區開士多也不是甚麼大富大貴，那個年代，只求「搵食」而已。在徙置區未落成前，他在這裡已住了十年。

爛地與山邊

一九四五年，十二歲的蔡楚邦跟父母弟妹坐船從潮陽來香港，「在現時的元州上岸，當時還是海邊。爸爸在鄉下做生意，好大膽去買黃金，打完日本仔，和平後，黃金大跌，惟有賣掉亞爺分給他的田，一家大小來香港。亞爺亞爸之前曾在香港住過一陣子，運豬到香港賣，我已經是第三代。最早期在蘇屋村那邊搭石屋住，養下豬。我們一家大小到香港後，打算在青山道，現在大慶燒味對面租舖做生意，月租三十，不過最後沒做，繼續養豬。」

古墓在一九五五年才被發掘，「蔡仔」的童年時代，李鄭屋一帶還是山邊，遍地木屋，「以前只得青山道一條路，順寧道還是爛地。現在的保安道街市，從前是木屋區，有十幾廿家人是姓蘇的，是當時蘇屋村的位置。裡面有一間細細的祠堂，都是屬於蘇屋村的。中聖書院那邊也是木屋。第十座旁邊的井，在建徙置區之前已在那裡，農夫用來淋水，不是很深的井。現在蘇屋，那邊以前都是山坡，山上還有金塔，小時候經常去山邊玩，不懂避忌。古墓從前又是山坡，有段日子常常跟那邊的客家小孩玩樂，但我不懂客家話。小時候好百厭，大家一起去偷木瓜，又上山偷石榴。古墓入面全部是陪葬品，只是碗碟之類沒甚麼特別，做小孩時都有走入去玩。」

蔡氏一家是火災上樓的第一代，蘇屋村寮屋區火災，他們的石屋安然無事，「我們繼續在石屋住，政府來登記，有部分人搬去黃大仙，李鄭屋徙置區落成後，我們就正式上樓。其實之前很多人把菜田租給人搭屋，很多從中國來的難民都住這些木屋，還有很多人要睡騎樓底，因為沒錢交租。平日收起家檔，晚上才出來睡，這其實不合法，差人會驅趕。我知道有次李鄭屋為甚麼火燭，我認識一個姓姚的潮州人，以前在街邊賣滷水鵝，當日是他媽媽生日，他們在家弄煎炸食物，燒木燒柴，不小心弄翻油鑊。」五十年代寮屋區

火災頻仍，單是李鄭屋這一帶也發生了不少，不知這是大的還是小的，災情如何。

蔡老闊在永隆街擺檔多年，見證街頭風光轉變，多少人物走過身邊。「初初到，永隆街青山道只有很少樓宇，四圍也是空地。青山道有家大華鉛筆廠；現在創興銀行位置從前是爛地；洪慶早就有了，之前是米舖，姓鄭的潮州人開，後來全家移民去了加拿大。永隆街口豐泰米舖也是潮州人，榮華酒莊則是客家人開，全部小時候已經認識。」轉眼六十年，有老去的，也有離去的。

五十天的集中營

潮州小子與客家小孩玩樂，同時透過學習廣東話，慢慢融入徙置區的生活。「之前在鄉下也有讀書，剛到香港時在青山道讀小學，好像叫新民學校。當時初來到，不懂廣東話，老師對我特別照顧，叫我跟她一起讀，一句跟一句，不過只是讀了三年，不是老實沒錢交學費，是自己不喜歡讀書。」十五歲開始，蔡楚邦到油麻地果欄批發買貨，在街邊賣橙。

後來有潮州人介紹他到深井紗廠工作，李鄭屋爆發暴動的一九五六年十月，他正在工廠上班，「十座對著永隆街，因為區長撕下了國民黨旗，引起不滿，圍著區長理論。記得當日我剛出糧，返到李鄭屋見到暴動，於是返工廠，但成廠人都被拉去到寶聲紗廠（福來村位置）大笪地，男男女女都有，差人站在中間，一邊打人，但同時也有放人走。當時紗廠都有兩派，右派打左派，工友又打工友，我沒參加任何組織，又沒跟人打交，不過都被差人拉，之後被帶到大包米集中營，即是現在紅磡車站附近，無審無問，有飯食，見到裡面個個待遇都一樣。如果被差人影到相就會問話，困了五十幾日，最後車返去青山道紗廠。都沒所謂，入面有得食，又沒被打傷。」整整個多月沒有回家，蔡仔說，回家後老蔡也沒問發生了甚麼事，大概大家也知道，二十三歲的青年是當時的嫌疑分子。「住七層徙置大廈的人，多數都是走難來香港，當中又有外省人，有時發生磨擦不服氣，離鄉別井又不習慣。」

街邊擺賣的日子

蔡楚邦是長子，有六個弟弟一個妹妹，主要由他幫助父親打理士多，「最初住在三座六樓，當時賣街邊，成日搬上搬落，跟區長好好傾，叫我們搬去樓下。當時全家也差不多十個人，八兄弟，兩間換兩間，然後又叫我去第六座，樓下近空地比較方便。後來六座地下成了寮仔部（寮屋管制組），住地下的人大部分搬到黃大仙，我們不想搬，於是搬去第五座，後來申請地下的店舖做生意，又搬去第四座住。」蔡老闆說當時區長找他父親，但父親總會叫他去處理，而他很堅決的說，從來沒有主動找區長，更沒有洗黑錢。「可能區長經常幫襯，大家熟落，或者是同情我們。當時好多人問我是否用了很多錢去換屋，但我真的沒有洗黑錢。區長分配兩間地下的舖給我們，我送他兩盒橙，他都拒絕，要付錢買。不過總是沒人相信不用洗黑錢。」五座地下的士多叫「蔡二合」，原來是因為去果欄買生果時，商販在盒上寫了「二合」，加上蔡字以作識別。

搬到五座時，蔡楚邦結婚不久，「亞爺亞幫我在鄉下找了老婆結婚，親戚介紹，只有亞爺見過。」不過蔡老闆那時還沒有回到士多幫忙，「老竇做士多，我在永隆街賣生果，後來老婆也在士多幫忙。最初間屋十四蚊租，舖就五十，售賣餅乾汽水零食，我記得兩毫半子可樂，還有賣維他奶會送麵包。」士多面向廣利道，對面全是學校，「慈恩、崇正學校的老師我都認識，他們經常幫襯，我會送貨入去，校工都識得。」

五六十年代在街邊擺賣，總會遇上黑白二道的「保護」，「我從沒有畀黑錢，試過有人問我，我話：『你唔夠紅，叫個紅』。』隔兩日便有差人出現，只拉我一個，我不肯就範，當時四圍圍滿街坊，我就話：『大家街坊，我無畀黑錢，佢要拉我』，當時我好火爆，我話，『你拉我先搵槍打死我，你唔夠膽就將把槍畀我，我打死你算。』對方話我仔細老婆嫩，我話全部交託外公，我唔想做人。最後他們沒拉我，之後其他差人都不敢再來。當時一毫子一個蘋果，毫半子一個橙，賣街邊能賺多少呢？」不知道有沒有街坊看過這一幕？

除了應付「收保護」，又要想著如何保護子女，「七層大廈好多人成日打交，大恰細，子女要好好管教，否則容易學壞。」蔡楚邦擔心的是大仔，「陪大仔見家長，我跟老師說，他讀六年級我只讀到三年，我沒法教他。我大仔不喜歡讀書，有個同學『食（白粉）』，常常看到他們在六座球場打波，擔心學壞。有次他買了一部舊單車回來修理，不怕污糟，我知道他對汽車有興趣。我老婆亞叔在泰國開車行，我問個仔是否願意去泰國，最初他只想去旅行，結果去了一次，返到香港又說要返泰國，當時十四歲，最終在泰國六年，一年返香港一次。白天工作，晚上幫亞叔收車租，他把所有人工全部

儲存起來，用來買金器送給媽媽。我都好開心，最初怕他學壞才把他送到泰國，難得他願意。返香港後最初在士多門口替人修理汽車，後來我送他一部麵包車，方便裝零件，可以出去接生意。」

今天兒子跟他一樣做了老闆，不是士多而是修理汽車。徙置區重建時，蔡楚邦結束了士多，「我問子女想不想繼續，他們都不想做，因為做士多完全沒有時間休息。他們還在讀書時，兩個上午校兩個下午校，輪流在舖頭幫手。士多六點開門，到晚上凌晨才有時間吃飯。」

盲婚啞嫁 相依相伴

從石屋到徙置區到屋，蔡楚邦從沒離開李鄭屋，「徙置區甚麼人都有，我開舖頭，沒人騷擾我，我又沒加入任何組織，從來沒有人敢來搞事。在街邊擺賣常見到人打交，蝦蝦霸霸，又話認識黑社會，乘機搞事。我覺得住在哪裡都一樣，無所謂。我兄弟中最大，個個叫我大哥，叫我老婆做大嫂，我沒跟人『烱氣』，總之不要行差踏錯，你尊敬

人人尊敬你，個個人都好好啦。」沒有慨嘆，沒有抱怨；環境轉，世情變，最終還看你怎樣待人處世。蔡老闆說經常有人跟他打招呼，「我這個年紀認人很差，眼不好，有時有人走來叫我老細，我都說不用叫了，我都沒再做了。從前的人叫事頭，叫老細就比較先進。還有很多我不認識的人告訴我小時候常常幫襯，我常常說對不起，不記得你是誰，眼看不清，耳又聽不清。」老闆記性其實相當不錯，至少數十年前的事也歷歷在目。

蔡楚邦太太如今住在深水 的老人院，八十歲的蔡老闆，一星期總有幾天會拿著枴杖，去探望這位盲婚啞嫁，相處近六十年的事頭婆，「今朝見面時，她說跟我有緣份，又錫我兩啖，但前日又說不認識我。她清醒時很多話說。現在都好好，兩公婆大家幾十年無所謂，無烱氣。有人叫我排多幾間老人院會容易有位。我就話一間夠了，就排老婆這一間，要等多一陣都無所謂，去其他地方見不到老婆，而且又要兒孫兩頭走。」

那年，他二十五，她二十四，兩人首次見面，他問她：「你鍾唔鍾意我先，如果唔鍾意仲有條路可以行。」她說：「鍾意。」自此，他們生了四個孩子，現在連曾孫也有了。

「我識你老實好耐，佢未結婚已經識，成日坐埋傾偈，大家潮州人，比較親切。佢響石硤尾做，我都知，我讀書少，文化無你亞爸咁高。」每次見到蔡楚邦，總有一種莫名的親切感，彷彿看見他倆在公園裡閒談到的景象。

徙置區商舖

寮屋內有不少商店及小型工場，清拆後也獲分配在徙置區地下兩個打通後的二百四十呎單位繼續營運，租金為一百元。小型工場像藤器、刺繡等，也可以繼續在住宅內進行，大部分居民也接受這個安排，而市政局亦特別放寬條例，好讓他們繼續營業。後來因為舖位不足，被清拆的寮屋區商店也不能獲派單位，改以金錢賠償。

英文變數字

政府最初興建徙置大廈的時候，是以英文字母為每座大廈命名的。一九五八年，石硤尾及黃大仙徙置大廈已超過二十六座，新落成的大廈以A A、B B等排列。

一九六五年十月十一日，所有徙置區的座數由英文轉成數字，徙置事務局稱這是為了統一，減少誤會，而且很少居民懂英文。新名稱由十月十八日起生效，大約需要兩個月完成大廈外牆的更改，涉及十二座，二百四十三座大廈。

區長

一個助理徙置事務主任管理一個屋，並由地區主任協助管理。日常直接處理事務的是地區主任，俗稱為區長。一般一名地區主任負責兩座徙置大廈，約四五千名住戶，負責公眾衛生、店舖、管理內的清潔工人，另外也負責租務，例如租戶的居住狀況，如增加或減少人口，還有提醒租戶要注意衛生，有時甚至需要解決居民間的糾紛，特別是住在同一單位的兩個家庭。

保安道

保安道的名稱，源於香港當時所屬的寶安縣，故原名「寶安道」，以示香港與寶安的關係密切。六十年代以後，或許為了簡化的原因，寶安道被改為保安道。也有人說是因為一九六七年以後，當局認為保護市民的安全十分重要，故把「寶」字改為「保」。（梁濤：《九龍街道命名考源》，市政局刊物，一九九三）